

第一代领导集体成熟的重要标志

——四论“毛周体制”兼答施志成先生

汪 浩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摘要: 实事求是地对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过程及其运行情况作综合分析, 我们就不会得出“‘毛周体制’说违背邓小平‘领导集体’说”的结论。“毛周体制”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属性, 是第一代领导集体成熟的重要标志。“毛周体制”所揭示的宝贵经验, 对于落实“三个代表”,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 周恩来; 毛周体制; 领导集体

中图分类号: A8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444(2002)04-0433-06

我自发表《简论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文^[1], 提出“毛周体制”一说, 祝尔康、殷红坚、赵春生等同志不吝赐教, 发表了支持、反对或间于二者间的不同意见^[2], 受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关注。其后, 我在《再论“毛周体制”》、《三论“毛周体制”》二文中^[3], 相继回答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 并进一步补充、丰富和完善了关于“毛周体制”的观点。2001年“全国周恩来党建思想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淮安召开, 我的“三论”在会上交流并获奖, “毛周体制”一说, 得到与会专家的广泛赞同。然而, 不同意见依然存在, 这当然是正常的。值得高兴的是, 今有施志成先生, 如同祝尔康先生那样, 直率地批评“毛周体制”违背史实, 违背邓小平关于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科学论断, 断言“毛周体制”说不能成立^①, 于是就有了这“四论”, 算是回答, 同时也就相关问题, 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论争在深入

邓小平同志指出:“遵义会议之前, 我们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

白、向中发、李立三到王明, 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 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 弼时同志去世后, 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 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 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4]

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过程及组成成员的简略概括。施志成先生断言“毛周体制”说违背了邓小平的这一“领导集体”说。诚然, 从邓小平的上述概括中, 的确看不到“毛周体制”的丝毫痕迹, 施先生引用这段话来证明“毛周体制”说不能成立, 表面看来很有说服力。然而, 施先生仅仅引用这段话来与“毛周体制”说作简单对照, 便作出“违背”的断论, 未免太简单化。其实, 施先生在这里, 耍了一个障眼法——辩论双方常常有意无意而使用的小“技巧”——“偷换概念”。不是讲的同一问题, 当然难免各执一端, 南辕北辙。邓小平所讲的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和组成成员; 而“毛周体制”讲的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体制

收稿日期: 2002-05-31

作者简介: 汪浩(1942), 男, 江苏涟水人, 淮阴师范学院副院长, 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高等教育研究。

与运行机制。不错,二者之间确有联系,都是讲第一代领导集体,但又有区别,讲的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结论显然不可能相同。怎么能简单地以此来否定“毛周体制”之说呢?

同样,也不能用邓小平两次提“毛刘周朱”的排序,来作为否定“毛周体制”的依据。周作为毛的主要助手,这已由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在周恩来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确定,不应再有疑义。引用经典作家的结论,切忌断章取义。关于周恩来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特殊地位,邓小平多次讲过。在由他亲自主持起草,并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将周排在紧挨毛之后的第二位,这已成为全党共识。另外,我在“再论”一文中引用中央文献研究室曹应旺同志的研究成果:在《邓小平文选》中,有多处“毛周并称”,邓小平把“毛周”作为那时领导我们国家的代表人物,作为那个时代的象征,这就是“毛周体制”的最好说明。只要我们把邓小平关于“毛周”、关于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周恩来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特殊地位的多次讲话,作综合分析,就不会得出施先生那样的结论。

感谢施志成先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把“毛周体制”说与“领导集体”说的关系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的确,在此之前,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朦胧的。虽在“再论”中有所涉及,但没有明朗化、条理化,缺乏科学的概括。施志成先生的尖锐一击,使我茅塞顿开,也无疑将“毛周体制”的讨论引向深入:由最初的“表面文章”进入揭示实质的阶段。起初的讨论,局限于表面上、形式上的问题:比如周不是二把手啦,党的文献上没有依据啦,权威人士没有讲过啦,有“朱毛”而无“毛周”,提“毛周体制”置朱德、刘少奇于何地啦……接下来有同志认为“毛周体制”一说,在建国后,毛为主席,周为总理,能够成立,但建国前,缺乏依据,不能成立;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助手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配合和辅助毛的这种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事实胜于雄辩”,但能否说就是“毛周体制”,需要慎重,等等,开始进入问题实质的探讨。感谢施先生的谬赞:说什么我的“再论”、“三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给人以雄辩之势”,使“反对”“折中的观点”,“支离破碎,灰飞烟灭”。真是不敢当。施先生不愧是辩坛高手,深知抬高捧重之理,一扬之后,再来一抑。施先生

当然知道,固守原有阵地,执着前人所说的那些观点,已经没有意义。施先生的高招在于深知要击倒对手,必须抓住对手的要害。只要点明其与某权威人士的结论、提法相违背、不一致,那么它必然立不住脚。施先生关于“毛周体制”说违背邓小平“领导集体”说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

“毛周体制”说真的违背“领导集体”说?这不是一两个人的一两句话,或者用权威人士的话来作简单对照,就能定论的,这需要科学的分析和合乎逻辑的论证。否则就不是解决学术问题的科学态度。

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 与“毛周体制”的确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周体制”说是不是违背邓小平的“领导集体”说,除了通过对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及其运行情况,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外,别无其它途径。因此,我们必须让事实说话:

周恩来是遵义会议最关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遵义会议前,张闻天、周恩来在党内领导的位置仅次于博古,而周又是最高军事“三人团”(还有李德、博古)成员,湘江战役惨败后,李德、博古已很难再实施领导,周恩来以其在党和红军中的威望坚持着实际的领导地位。通道、黎平会议实现“改向”与“转兵”,就是在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的意见,实施对红军的领导的情况下实现的。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过,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目前有案可稽的关于遵义会议的唯一一份正式通知,是以“恩来”的名义发给李卓然、刘少奇二同志的。虽然“左”的路线使党和红军遭受重大挫折,但党内仍有一些同志尚缺乏清醒认识。周恩来通知各军团的负责人参加会议,这些人来自第一线,对“左”的军事路线造成的灾难感受最深,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有不同程度的认识,这对保障会议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在博古的主报告后作副报告。他坦诚地自我批评,承担军事上遭受重大挫折他应负的重要责任。同时也严肃地批评李德、博古错误的领导和错误的指挥,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光明磊落地推荐毛泽东出来领导,为遵义会

议成功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当时在全党全军中的影响和威望显然高于毛泽东,但他义无反顾地推举毛泽东,特别是遵义会议决议周恩来为最高军事负责人,毛泽东是周的帮助者,但在此后的军事决策和指挥过程中,周恩来处处维护毛的意见,以毛的意见为决策的依据。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在那种关头,只有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5]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以党和革命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的广阔胸怀。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在红军二进遵义后的鸭溪会议(1935年3月11日)上,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大家都说要打,只毛一人说不能打。因其余人一致通过,毛只好服从。但他总认为不妥,当晚毛到周恩来处,建议周推迟发布命令,再加考虑。周恩来接受毛的建议,第二天早晨又开会,把大家说服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毛的意见是对的。这虽是一个战役方案的调整,但可以看出周当时对毛的信赖和倚重。此事之后,大家认识到,在当时特殊情况下,太多的人参与军事决策,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情况,必须简化决策程序。四渡赤水后,少数同志对“毛泽东用兵真如神”有了认识,于是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议成立新的军事三人小组(1935年3月下旬),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此后出于对毛的尊重,周恩来逐步由我党军事上的最高“负责人”转变为毛的“帮助者”;毛泽东逐步由周恩来的“帮助者”转变为事实上的“负责人”。从此,毛周建立了“毛负责,周帮助”的长达40多年的合作关系。而当时全党的工作重心是军事工作,这不仅反映了当时我党最高领导层基本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而且也说明了“毛周体制”此时已初具雏形。

遵义会议后不久,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自此到六届六中全会前后,我们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一度形成了事实上的“洛毛周”领导体制。洛甫(张闻天)“负总责”,周恩来是军事上的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毛泽东是周的帮助者。到达陕北后,下寺湾会议(1935年11月3日)决定,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周恩来任军委副主席,正式由“洛周毛”转变为“洛毛周”体制。在此期间,不管是“洛周毛”,还是“洛毛周”,毛泽东都处于事实上的核心地位。洛周二人,从遵义会议起,都诚心拥戴毛泽东为全党领袖。张闻天是从“左”的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

的,在遵义会议前,他与王稼祥在毛泽东的影响下,逐步认识到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领导的错误,在通道、黎平会议上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实现了“黎平转兵”,为遵义会议创造了可能和准备了条件。遵义会议期间,他与王稼祥支持毛泽东,批判中央“左”的军事路线,他的发言被称为“反报告”,与周恩来的副报告相呼应,为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领导权问题,党的领导问题尚未解决,会上大家曾有比较一致的意见,由洛甫接替博古总负责,由于洛甫再三推辞,未作决定。1935年2月5日,在鸡鸣三省村,洛甫向毛提出变换党的领导,毛找周来商量,周认为应由毛出来领导,毛认为还是洛甫比较合适,并“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5]。这是极富重要意义的一件事。后来,洛甫“负总责”。他与周恩来一样,虽身处高位,但坚信真理在毛泽东方面,“凡重大事情都先与毛泽东商量,然后开会讨论。毛泽东的主张、方针、策略,在张闻天这里通行无阻,都能够及时得到贯彻”。1935年8月9日,潘汉年“传达了共产国际对于现在中共中央新的领导体制的肯定与支持的态度,以为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领导是经过实际斗争锻炼和考验的,是能够胜任和可以信赖的”^[6]。1938年8月,王稼祥同志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应以毛泽东为首来领导。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洛甫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推举毛泽东任总书记,毛经过全面考虑,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要洛甫继续“负总责”。洛甫让贤不成,此后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虽仍由他主持,但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由毛泽东决断。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27日—11月7日)前夕,周恩来赴武汉,继续与国民党谈判。10月4日,转交了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信件^[7]。这一典型的历史细节,不仅生动地说明毛泽东是当时我党我军的实际负责人已为共产国际、全党全军所确认,甚至也为当时我党的政治对手蒋介石所承认,而且还说明毛泽东处于决策中心,周恩来处于办事中心。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时候,周恩来赴武汉谈判。这标示着“毛负责、周帮助”这一在遵义会议后逐步形成的我党最高军事领导的运转机制,在西安事变后,转变为“毛主席内,周主外”的运转机制。也就是“毛负责,周帮助”这一

运转机制已经不单单是军事方面,已经扩展到党的全部工作了。此后,1939年,张闻天主要负责党的宣传教育工作,1940年5月,张闻天主动交出书记处的全部工作,中共中央的全面工作已经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进行。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中央政治局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毛泽东被推举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确定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1945年4月,七大召开,选举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常委,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组织形式上得到了确认。建国初,任弼时同志逝世,陈云同志进入常委。八大时又增加了邓小平同志。后来又加了林彪,直至“文革”,毛刘周朱陈邓林组成中共中央常委会,这就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基本过程。

三、对第一代领导集体几个关键问题的认识

关于领导权的转换。我们党从遵义会议至七大这10多年时间里,逐步实现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权由执行“左”的路线的政治集团,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领袖群体的转换。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领导权问题,这是当时最紧迫也是最关键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解决,还留着两个尾巴:一是党的领导权尚未解决;二是形成“周负责,毛帮助”的指挥机制,正确军事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毛泽东却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最高负责人。直至陕北下寺湾会议,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军事领导权的转换才真正完成。同样,党的领导权的转换也是渐进的。遵义会议先解决军事领导权,目的是为了团结更多同志,以保证军事领导权问题的顺利解决。遵义会议,甚至曾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但政治问题特别是组织领导问题不解决,必然会影响甚至干扰正确的军事路线的贯彻与执行,所以遵义会议后不久,由洛甫提议,毛与周商量,说服了大家,由洛取代博古,基本上解决了党的领导权问题,但也同样留着两个尾巴: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路线尚未得到全党确认,二是毛泽东尚未成为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经过了洛周毛——洛毛周——张闻天离开书记处——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七大确立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集体这样渐进的过程,我们党领导权的转换才真正完成。

关于“毛周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明朗化。前文在叙述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过程中,同时论证:不论是“周负责,毛帮助”,还是“毛负责,周帮助”;也不论是“洛周毛”,还是“洛毛周”体制,领导核心都是毛泽东,其运转机制是“毛负责,周帮助”。也就是说,在第一代领导集体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毛泽东为领袖,毛为决策中心、周为办事中心,毛一周为运转轴心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已逐步明朗化。这方面,前文已通过关于张闻天取代博古负总责,以及他主动让贤,毛泽东让他留任,关于攻打打鼓新场战役方案的调整;周恩来没有出席六届六中全会,转交毛致蒋介石信件,继续与国民党谈判等典型事例进行了论证。下面再举历史转折时期,我们党重大战略决策的决定与实施过程,来作进一步说明: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瓦窑堡会议上,在民族危亡关头,讨论中央今后的战略问题,毛泽东作主题发言,提出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问题。博古强烈反对,他引斯大林话说:“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8]次日,毛泽东再次发言,严肃批判了这一错误理论,并告诫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受到了张闻天、周恩来等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并形成了“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时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的战略决策^[9]。在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党中央在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不失时机地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基本的战略方针,为我们党以后抗日战争时期的大政方针奠定基础,其中包括为后来的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我们党及时正确地处置创造了可能。显然,毛泽东是制定这一大政方针的主心骨。西安事变,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赴西安,使事变得符合民族利益、符合我党战略的正确解决。其后,周恩来代表我党工作在国民党的心脏部位,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重大贡献。这一完整过程,可以说,充分体现了毛是决策中心,周是办事中心,谋事是毛,成事是周,毛一周为运转轴心这一基本模式。也就是说,我们党最高领导层,在瓦窑堡会议至西安事变前后,毛为核心,毛一周为运转轴心这样的领导体制已经基本明朗化。

关于内部的破坏与挑战。遵义会议至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初具雏

形的时候,曾遭受林彪发难,要求罢免毛泽东;张国焘另立中央;王明拉共产国际大旗,以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为口号,再次阴谋篡党的破坏与挑战。面对这三次重大考验,我党最高层的领袖们,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包括转变后的博古等同志,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周围。毛泽东以其大智大勇、远见卓识,领袖群伦,使我们党最高层的领袖群体初步形成了群星拱月的局面。这期间,朱德身处张国焘军中,多方受张的掣肘,但他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反对另立中央,支持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在王明再次阴谋篡党时,周恩来初期没有识破他的阴谋,被他拉大旗作虎皮的伎俩所迷惑。一经毛泽东揭穿他的右倾投降的本质,周恩来就认真检讨自己,总结历史经验,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他说,“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7]。“我们党在历史上几个时期的许多成功,都是因为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思想和路线。……可以说‘左’倾右倾都不懂得领导权问题,不懂得争取这个领导权。”^[10]“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路线。”^[7]可以说周恩来是在中国革命以及自身经历的曲折中最早领悟并将毛泽东思想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度的我党最高层极少数领导人之一。至于林彪的跳梁表演,在会理城郊的铁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张闻天严肃地批评了林彪,同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得到了全会的赞同。此后包括曾坚决反毛的博古、凯丰等人,也都转变了思想,这为后来粉碎张国焘的篡党阴谋奠定了基础。张国焘出于个人野心,依仗人多枪多,反对北上抗日,要求改组中央领导以统一军事指挥,意在取代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他反对北上抗日违背党和人民的意愿,这就决定他必然失败。加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四方面军内有极高威望,特别是毛周商量后,周恩来主动将红军党政委让给张国焘,使中央处于揭露张国焘有理有利的地位。果然张国焘得寸进尺,另立中央,还企图危害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在危急关头,周恩来全力支持毛泽东,果断北上,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红军内部冲突。张国焘最终迫于形势,特别是党内军内的众叛亲离,他不得不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最终实现了党领导的红军三

大主力的会师。在此期间,周恩来帮助毛泽东审时度势,协助毛泽东决策和指挥,为维护毛泽东领袖地位,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特别是毛周体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毛周体制”与“文革”。出于接班的考虑,毛泽东曾先后安排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处于显赫地位,意在成为他的接班人,这些人尽管排在周恩来之前,但都没有动摇毛一周这一第一代领导集体最基本的配搭关系,一直坚持着毛为决策中心,周为办事中心这一基本的运转模式。只是在“文革”中,毛泽东为解决“司令部”问题,一方面仍维系着毛一周这一运转轴心模式,另一方面又增设“中央文革小组”,作为另一办事中心,形成又一运转轴心:

毛泽东——^{林彪(前期)}——“中央文革小组”
“四人帮”(后期)

这样就出现“双轴心”的混乱局面。或许这正是毛泽东“乱了敌人”的战略安排。因为毛泽东清楚,依靠周恩来这一办事中心,解决刘少奇这一司令部的问题是困难的。尽管如此,由于全党对周恩来的信赖,也由于毛泽东清醒地坚持,毛泽东最终还是依靠毛一周这一轴心体制,解决了林彪、“四人帮”问题。也就是说,“毛周体制”在“文革”中尽管受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但一直维系着,最终依然发挥了稳定和领导全党、全国的重大作用。

四、“毛周体制”揭示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属性

综上所述,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从遵义会议到七大经历了初具雏形、在斗争中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经过领导权的转换,领导成员的调整,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以毛一周为运转轴心的领袖群体。这个领袖群体,前期包括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后期包括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等。张闻天是这个领导集体形成过程中重要的过渡人物。不管前期还是后期,也不管领导成员怎样变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始终是这个领导集体的老班底,毛一周合作关系是这一领导集体最基本的、起主导作用的轴心关系。

关系就是本质。就一个领导班子来说,领导成员间存在着多重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比按照排列组合公式计算出来的总和还要多,但其中以“班长”为决策中心与以常务副手

为办事中心, 这二者合作所构成的轴心关系, 决定了这一领导班子的组织体制及其运行机制, 是这一领导班子诸多关系的本质所在。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 毛一周关系是反映这一领导集体本质的基本关系, 处于主导地位。其它关系, 如毛朱关系、毛刘关系……周刘关系、周朱关系等, 都处于从属地位。朱德同志曾说: 周恩来“是个管家的, 管这个家”^[11]。杨尚昆说得更清楚: 毛泽东同志“是当之无愧的主帅, 恩来同志是名符其实的副帅”^[12]。毛泽东也曾风趣地对周恩来说: “你那里是轴心。”^[11]所以, 毛周体制不仅是我们的历史性选择, 它伴随我们党的成长而成长, 成熟而成熟, 而且在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心目中, 包括老一代革命家中早已成为共识。在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 毛泽东为核心, 毛一周为运转轴心的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 即“毛周体制”, 是我们党的历史性选择。这个选择, 是以鲜血与生命为代价的曲折过程。这其中包括全党对毛刘周朱陈邓这些领袖人物的选择, 也包括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老一代革命家对毛的选择, 还包括毛泽东对他们的选择, 特别是毛周的相互选择。毛周在曲折与教训中终于相互选择, 并形成 40 多年的成功合作, 促成了“毛周体制”伴随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产生而产生, 成长而成长, 共同经历了初步形成到发展、到成熟的过程。所以毛周体制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内容, 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属性。“毛周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确立, 是第一代领导集体成熟的最重要标志。

“毛周体制”所揭示的宝贵经验告诉我们, 一个成熟的高层领导班子, 必须注意三个方面: 一是一把手的选拔; 二是一、二把手的配搭; 三

是领导成员的优化组合。这其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必然也是必备的条件和要求。这在今天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加强党的建设, 尤其是领导班子建设, 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注 释:

① 施志成先生给笔者的信。

参考文献:

- [1] 汪浩. 简论毛泽东和周恩来[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1998, (1).
- [2] 祝尔康.“毛周体制”这一提法恰当吗[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2002, (2).
- [3] 汪浩. 再论“毛周体制”[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2000, (5); 三论“毛周体制”[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2001, (3).
- [4] 邓小平.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A].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09.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 周恩来自述[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2: 176; 176.
- [6] 佟静. 延安. 张闻天支持了毛泽东[N]. 光明日报, 2000 6 15.
- [7] 金冲及. 周恩来传[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524; 693; 218.
- [8] 李涛. 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M].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135
- [9] 金冲及. 毛泽东传[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378.
- [10] 周恩来. 论统一战线[A]. 周恩来选集: 上[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218.
- [11] 曹应旺. 周恩来亲历记[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299; 296.
- [12] 杨尚昆. 相知相识 50 年[A]. 周恩来百年纪念: 上[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42.

The Major Symbol of Maturity of the First Leading Group

WANG Hao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Jiangsu Huaian223001, China)

Abstract: By a matter of fact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first leading group, we could conclude that Mao Zhou system is not in contradiction with Deng Xiaoping's leading group theory. As a major symbol of maturity of the first leading group, Mao Zhou system is the major feature and basic property of the group.

Key words: Mao Zhou system; leading group; Mao Ze dong; Zhou En lai

责任编辑: 张 超